

分类号_____

密级_____

UDC_____

学 位 论 文

在中亚传承的中国西北民歌——东干民歌研究

赵塔里木

指导教师姓名 王小盾教授

申请学位级别 博士学位 专业名称 中国古代文学

论文提交日期 1998.9 论文答辩日期_____

学位授予单位和日期 扬州大学

答辩委员会主席_____

评阅人_____

1998年10月 日

An Abstract of the Thesis

This thesis was directed carefully by Prof. Kunwu Wang, it consists of preface, text (5 chapters) and conclusions.

In the preface, the author gives an account of his works' purpose, methods, the sources of his data, etc. He points out that the North-west Chinese folk songs being handed down by Dungan, a nation that moved from the North-west of China to the Centre Asia, offered a living, time-marked data of North-west Chinese folk song. The study of the Dungan folk song would give us a reference system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olk song's history. In his works, the author attempts to use different methods to achieve his purpose, for example, combin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search with the method of Ethnomusicology research, combining the Literature data with field work data. The main data of the article is the author's field work records.

The 1st chapter, the author introduces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Dungan's folk song, such as the Dungan's migratio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ir population, culture and education, religion, etc.

The 2nd chapter, is the classification of Dungan folk songs. In the author's opinion, when those North-west China folk songs were being on Dungan's lips, they also carried on their classification of in China, for example, they think that "Quzi" include all kinds of the Musical-Literature, such as folk song, local opera, and "Shuo-Chang" (a genre of popular entertainment consisting mainly of talking and singing).

The 3rd chapter, the way of Dungan folk song's handing down. The way by handing down orall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eserving the national culture of Dungan. In this process, they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words of the folk song's completion with the aids of music.

The 4th chapter, the character of Dungan folk song's words. In this part, the author tells us that, most of the Dungan folk song's words obey the rules of rhyming strictly, their rhymes reflect the sound characters of the North-west dialects in China.

In the 5th chapter, the author classifies the melody construction of Dungan folk songs and North-west Chinese folk songs, and then compares analyzes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nd then points out that the Dungan folk song is a paragon of the North-west Chinese folk song construction, in late Qing Dynasty.

In the last section, the author concluded that, the Dungan's handing down the North-west Chinese folk songs, is the needs of their cultural conformity. With the help of double forms Music and Literature to study the folk songs of Dungan, we can reveal its fundamental functions and main spreading regulations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内容提要

此文在本师王昆吾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得以完成。

全文分为绪言、正文五章和结论。

绪言,首先说明选择东干民歌作为研究对象的缘由。由于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民歌记录在客观性、完整性或年代标记方面的模糊性,民歌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轨迹难以得到科学的描述,讨论民歌与作家诗歌的关系问题也因此失去了真实的前提。中亚东干人保存着的中国西北民歌则为改善上述状况提供了活着的、并且有着年代标记的民歌史材料。其次,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中国文学研究者已经在考虑汉民族文学艺术与周边文化的关系问题,而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则迫切需要系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田野工作资料支撑学科建设的基础。因此,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东干民歌的描述和研究,为中国民歌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活的参照系。利用这个参照系,反观中国西北乃至更多地区的民歌一百多年来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轨迹。在研究范围上,本文属于区域民歌研究。根据研究对象的性质,本文采用文学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结合的方法以及文献资料和田野资料相互参证的方法。本文所利用的材料,除前苏联出版的东干文民歌文献、中国明清以来的民歌文献、有关陕甘回民起义和迁徙的历史背景资料以外,主要是笔者的田野记录。

第一章,主要介绍与东干民歌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一、东干人向中亚的迁徙。包括迁徙起因、群体构成、迁徙路线和不同的目的地。二、人口分布以及生产和生活习俗。包括东干人的人口、聚居区分布、主要乡庄情况。东干人的物质、社会民俗以及陕甘旧俗的保存情况。三、语言、文字、文化教育和宗教信仰。包括东干人的语言、文字以及对陕甘方言的保存情况。本民族的学校教育、科研、新闻媒体以及伊斯兰教信仰情况。四、民间文艺资源。包括东干口传文学的各种体裁和形式、各种乐器和传统乐曲、民族乐队的活动情况以及东干学者对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对以上背景的描述,旨在为东干民歌及其在中亚的传承提供一个立体的解释坐标。

第二章,东干民歌的分类。主要从东干人使用的有关民歌的语词概念出发,结合文献和实际演唱中的使用情况,认识东干人关于民歌分类的内部逻辑。东干人在传承中国西北民间音乐文学的同时,也传承了包含于其中的传统分类方法。这种分类法隐含在东干人有关曲子的传统观念和行为之中,通过各种民间概念表达出曲子的不同类型。它不仅以内在的逻辑体现着传统分类的合理性,而且反映出东干民众对曲子本质特征的看法。在东干人的音乐观念中,“曲子”是包含了民歌、戏曲、说唱等所有可以演唱的音乐文学的体裁。新、老曲子的分类法有着传统与非传统的含义,反映着东干人对入俄前、后时间标准的关注。东干人所保存的民歌充分反映出历史上中国西北地区汉、回两族对中华文化的共同创造。通

过与西北民歌的比较可以看出,大多数东干民歌在经过长时间的、跨越广袤空间以及不同社会文化环境的流传之后,依然保存入俄前的基本样式。

第三章:东干民歌的传承方式。传承方式是东干民歌得以保存的重要方面。东干民歌在中亚地区的传承是一种独特的移民文化景观,其传承方式是东干人对移民环境做出的种种反应之一。东干民歌的保存主要通过社会传承的途径得以实现。东干人入俄后失去了旧日的民歌传承场合,但他们利用各种新的演唱场合使民歌的传播和保存得以延续。苏联时代是东干民歌流传和保存的关键时期,其动力来自东干人内部对本民族文化的强烈认同和政府方面的外部支持这两种力量的聚合。苏联解体后,东干民歌的传承处在失去政府资助、后继乏人以及一些宗教人士对演唱活动的负面宣传等困境之中。口耳相传是东干民歌传承的基本方式。东干人追求唱词完整性的目的在于完整地传承唱词中的中国历史文化内容。有经验的演唱者能够充分认识和利用唱词中有助于记忆的各种因素,并以音乐作为辅助记忆手段发展出自己的传承技术。东干民歌的变异范围和程度比较有限,主要表现在某些唱词由于语音转变引起的词义转变以及对不符合伊斯兰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的唱词进行部分改造。由于东干人长期离开母体文化,民歌传承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唱词仅保存声音外壳而丢失词义的现象。在个案《高大人领兵》的异文比较中,我们对这首民歌的各种异文进行了年代识别,注意到民歌传承中的异文叠加现象,提取了民歌传承中的稳定和非稳定因素,从而获得了对民歌传承规律的新认识。

第四章:东干民歌的唱词特征。本章在描述东干民歌唱词形式特征的同时,对唱词与曲调的同构关系给予了关注。我们注意到,不同体裁的东干民歌在唱词结构上有着特定的构成方式,并且与曲调的结构层次形成有规律的对应关系。在词拍的构成样式上,我们注意到文学界依词义标准划分节奏的习惯,注意到它的消极结果——难以显示唱词音响在时间过程中的运动和组合规律。认为必须将词义和音乐两个角度结合起来观察小曲子的词拍规律,以揭示这种音乐文学体裁在节奏方面的本质特征。由于把握唱词的押韵规律是东干唱家子们记忆、传承民歌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大多数东干民歌的唱词仍旧保存着比较严格的押韵方式,其押韵规律反映着陕甘方言的语音特征。东干民歌唱词中出现的词汇反映出不同的来源,它们在各种体裁中的分布情况不仅同东干人按时间标准划分民歌的分类法重合,而且提示了各种异文产生、流传的地域和年代信息。老曲子主要使用清末以前的陕甘方言词汇。新曲子除了使用陕甘方言之外,还使用东干人入俄后在陕甘方言基础上自造的新词和俄语借词。比较小曲子唱词的跨方言区词汇及其与中国元、明、清时期戏曲、小说等俗文学作品中相关词汇的关联,我们了解到清末以前通行于中国北方的一些词汇在东干民歌中保存和使用的情况,并且看到它们被使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第五章：东干民歌的音乐特征。本章首先从东干民歌以及中国西北民歌构造特点的实际出发，对东干民歌曲调和中國西北民歌曲调的构成要素进行了逐一的梳理和分类。被分类的构成要素包括旋律的句数和句幅构成、各旋律句的结束音、全曲的起止音、音域、音阶、调式、旋律线、旋律进行中的音程特征、典型进行、旋律发展手法、衬腔、音域和起止音、节奏、节拍及节奏布局、曲式结构等。然后对分类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和比较，并进一步结合民歌的传播背景，解释了不同异文的曲调发生变异的原因。统计结果显示，在东干民歌和中国西北民歌的同类曲调中，前者代表着清末以前中国西北民歌曲调构造样式的典范。利用这个参照反观中国西北民歌的曲调构成，可以显示其一百多年演变轨迹中的稳定和非稳定因素。

通过上述考察，笔者注意到东干民歌是作为汉语音乐文学的一个分支在中亚地区传承的，其方式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基本功能和主要的传播规律。除此之外，笔者对中国西北民歌在东干人中得以保存的原因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和思考，并得出以下结论：一、中国西北民歌在中亚东干人中的传承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二、东干人对中国西北民歌的顽强保存缘于东干社会文化整合的需要。三、中国西北民歌在中亚东干人中的保存得益于适宜的传承环境。四、东干民歌的保存借助于音乐和文学的双重载体。

目 录

绪言.....	(1)
第一章 东干民歌的历史文化背景.....	(5)
一·东干人向中亚的迁徙	
二·人口分布以及生产、生活习俗	
三·语言文字、文化教育和宗教信仰	
四·民间文艺资源	
第二章 东干民歌的分类.....	(18)
一·曲子——东干音乐文学的整体概念	
二·东干曲子的分类	
三·东干民歌的分类	
第三章 东干民歌的流传和保存.....	(49)
一·东干民歌的流传形势	
二·东干民歌的传承方式	
三·东干民歌变异的诸种影响因素	
四·个案：《高大人领兵》的东干异文与中国西北异文比较	
第四章 东干民歌的唱词特征.....	(89)
一·唱词结构	
二·唱词韵律	
三·方言词汇	
第五章 东干民歌的音乐特征（未打印）	
一·旋律分类	
二·音阶、调式	
三·节拍、节奏	
四·词曲关系	
五·个案：东干民歌与中国西北民歌《珍珠倒卷帘》的比较	
结论.....	(117)
参考文献.....	(121)
附录：	
1.东干民歌采集地示意图	
2.民歌《歌唱英雄白彦虎》中涉及东干人西迁新疆的路线示意图	
3.民歌《老回回过国》中涉及 1882 年东干人入俄的路线示意图	
4.用东干文出版的三本民歌集	
5.《中原民人曲子》中《卖货郎》的唱词和插图	

- 6.《中原民人曲子》中《珍珠倒卷帘》的唱词和《王祥卧冰为亲娘》的图案
- 7.东干民歌唱片《采花》的封套及三位演唱者的照片
- 8.70年代莱蒙托夫乡庄响器团的合影
- 9.80年代初东方曙光乡响器团的合影
- 10.东干人使用的部分乐器
- 11.米粮川响器团的一次演奏活动
- 12.歌手木萨在演唱《一对牛》
- 13.歌手傅乡老在演唱《放风筝》
- 14.歌手吴金友在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上为新落成的纪念碑献花
- 15.东干民居
- 16.东干人婚俗：新媳妇给婆家人行见面礼
- 17.东干人婚俗：翻穿皮袄闹公婆

东干人是19世纪末迁入中亚俄属地区的中国西北回民。一百多年来,在同中国方面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处于中亚多民族环境中的东干人一直顽强地保存着从故土带来的传统文化,并以此作为民族存在的重要标识。今日东干人所保存的传统文化,从不同侧面并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清代中国西北地区民间文化的面貌,东干民歌便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缘起

本文将东干民歌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出自以下考虑:

对中国民歌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轨迹作出科学的描述,这是回答中国诗歌史研究中民歌与作家诗歌相互关系问题的前提,否则,我们无法为“民歌是诗人诗歌的母亲”(1)以及二者在历史发展中“相互影响、并行发展”(2)等命题提供立论的根据。

描述民歌发展史要有扎实的材料基础,其难点亦在于此,这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口传性质以及语言和音乐合为一体的特征所决定的。清代以前,反映民歌流传情况的材料主要有散见于历代文献中的民歌记录和历代文人辑录的民歌集。这些材料的历史价值主要体现在被记录的民歌一般都有比较明确的年代标记,但其中的根本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些民歌大多被它的记录者——历代文人们以雅言润饰,失去了原本鲜活、质朴的民间语言。因此,仅仅利用这些材料很难看清历代民歌在语言上的真实面目。本世纪20年代前后,北京大学发起征集歌谣的学术运动,从此在中国拉开了科学地搜集和研究民歌的序幕。当时的歌谣征集工作本着忠实记录的宗旨,提出“歌辞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饰,俗字俗语亦不可改为官话”等记录原则,从而基本保证了所征集的一万三千余首近世歌谣在语言方面的真实性。歌谣征集工作还对民歌音乐方面的记录给予了关注,要求寄稿人注意“歌谣之有音节者,当附注音谱(用中国工尺、日本简谱或西洋五线谱,均可)。”(3)但这个要求未能在歌谣征集工作中得以实现,在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上刊登的大部分民歌仅仅是“有音节者”的歌词部分。1939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发起成立民歌研究会,开创了音乐界搜集、整理民歌的风气。当时音乐界搜集民歌的目的主要是为音乐创作的民族化寻找素材,因此忽略了对民歌中传统歌词的完整记录。在二、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文学界和音乐界基本上分别延续了北京大学歌谣征集运动和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民歌记录模式,给我们留下了大量民歌歌词或者曲调的记录。1979年,《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的编纂工作全面启动,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搜集、整理民歌的工作随之展开。目前,

各省、市、自治区的分卷正在陆续出版。《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收录的大多数民歌不仅有歌词和曲调两方面的完整记录，而且有关于歌词方言以及流传地域、演唱者情况的注释，关于采录时间、相关民俗等背景材料的交代，从而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国民歌在当今流传的状况。《中国民间歌曲集成》记录的民歌毫无疑问地带着旧日的印记，但是利用这些材料描述民歌发展史的困难在于：民歌中的历史印记在经历了多次时代变迁的冲刷之后，其年代标记已经变得模糊起来，需要参照其他材料才能得以确认。

从表面上看，可资描写民歌发展史的上述材料似乎已经十分充实，但是只要进一步审视这些材料，就会发现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歌记录分别在客观性、完整性或年代标记方面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并且难以在它们之间建立起互参、互证的真实联系。要改变材料不利的状况，除了进一步挖掘、利用现有文献资料和田野资料之外，还需要我们从更加广阔的范围中寻找新的材料支持。

东干民歌在中亚地区的保存，给我们提供了突破上述材料局限的一个机会。对于中国民歌史研究来说，东干民歌独特的资料价值在于：1）它虽然流传在当代，但其特殊的流传背景给出了这种风格存储的年代标记——时间下限不晚于19世纪70年代；2）它提供了一批活着的、有可能同文献记录建立起互证联系的民歌史材料。

二、东干民歌研究回顾

1931年，前苏联的东干历史、民俗学家Х·尤素洛夫(Хасан Юсуров)带领两名助手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和哈萨克斯坦的马三成乡、绍尔图拜乡进行东干口传文学的实地调查，由此开始了中亚东干民歌的搜集、整理工作。3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有更多的东干学者参与了这项工作。从保存在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文学部资料室的原始记录来看，当时的民歌搜集范围覆盖了大部分东干人聚居区，涉及到民歌的各种体裁。以1954年为界，这些民歌被分别用拉丁字母或斯拉夫字母的东干文记录下来。在东干学者的研究工作中，这些民歌记录主要被视为关于东干历史、民俗的口碑资料和语言研究的活材料，很少用于民歌本身研究。由此可见当时搜集东干民歌的主要目的。

1958年，尤素洛夫用东干文在伏龙芝出版了第一部东干民歌集——《中原民人曲子》，俄译书名为《Дунганские Народные Песни》（东干民间歌曲）。书中收入了编者认为属于“曲子”的作品40首，其中包括一部民间小戏《张连卖布》的戏文和一首名为《马老五的诗文》的作品，还配有《珍珠倒卷帘》、《出门人》、《卖货郎》、《孟姜女》等民歌的绘画插图。编者在序言中说明该书收入的民歌是从所有民歌记录中筛选和整理出来的，并指出“这些曲子大都是东干

人熟知并且会唱的。40首曲子的内容各不相同，中原人能从这些曲子中了解到过去的苦难生活。曲子中许多富有哲理性的唱词已经成了如今的格言。从曲子的所有内容中可以看出中原的文明。”1960年，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出版了尤素洛夫编写的《苏联回族口传文学的样书子》（东干文），书中分类介绍了东干口传文学的各种体裁，其中收入21首“曲子”和20首“娃们的曲文”（儿歌或童谣）。同第一本民歌集比较，该书收入民歌虽然不多，但在资料处理上出现了几个显著的特点：1）不仅发表新材料，而且收录已公布材料的异文；2）从类型上对“曲子”和“白口”给予区别；3）对唱词中的部分中国典故和东干人不常用的词句用东干文给予注释。同年，尤素洛夫还出版了《抒情曲子》一书，书中记录了民歌《珍珠倒卷帘》的五种异文，并注释了该民歌涉及的部分中国民间故事。1981年，尤素洛夫和尤素洛娃合编的《苏联回族人的曲子》出版，此书收入“曲子”82首，其中包括苏联时期由东干作家创作、在民间广泛流传的39首新民歌。但以上几本民歌集均为歌词记录。1985年，前苏联出版了名为《采花儿——回族民人的曲子》的唱片，收录了由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东方曙光”乡东干人演唱的8首传统民歌。

前苏联汉学家和东干学者对于东干民歌的研究大多散见于有关东干历史、民俗的综合性论著中，专题性的研究比较少见。比较有代表性的如Б·А·瓦西里耶夫在《东干口头文学》一文中对东干民歌的分析和研究、Б·Л·李福清在《万里长城的传说和中国民间口头传说的体裁问题》中对东干民歌《孟姜女》的研究、М·苏三洛在《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东干人的精神文化”一章中对东干民歌的概述以及М·哈桑诺夫对苏联时期东干新民歌的研究等。音乐界，苏联音乐学家维诺格拉多夫（В. Виноградов）50年代发表过简介性的《五首东干民歌》一文（4）。近年来，这个研究领域正在不断地受到关注，例如哈萨克斯坦的东干音乐学者扬其诺娃女士完成了对部分东干民歌曲调研究的副博士论文（1987年，未发表）。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产生一部比较全面地论述东干民歌的研究著作。在中国方面，胡振华教授曾从文学角度对东干民歌做了简介（5），1996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苏三洛《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一书的中译本，由郝苏民教授和高永久先生翻译。

三、本文的研究目的、范围、方法和材料来源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东干民歌的描述和研究，为中国民歌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活的参照系。利用这个参照系，可以反观中国西北乃至更多地区的民歌一百多年来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轨迹。

在研究范围上，本文属于区域民歌研究。作者相信区域民歌研究是深刻理解

中国民歌整体的基础。与此同时,本文还坚持从中国文学、音乐发展史的整体背景中观照东干民歌这一具体的音乐文学现象。东干“曲子”是包含了民歌、说唱、戏曲等体裁的音乐文学样式,本文主要研究其中的民歌部分,同时关注曲子内部不同体裁之间的相互关系。

研究对象的特质决定了本文采用文学研究和民族音乐学相结合的方法以及文献资料和田野资料相互参证的方法。对东干民歌进行科学的调查和客观的描述,将其与中国西北地区汉、回两族民歌进行多方面的比较,是实现本文目的的前提。

本文主要利用了下列材料:

1. 前苏联出版的东干文民歌文献。

2. 中国明清以来重要的民歌文献。如明代冯梦龙辑录的《挂枝儿》,清代华广生辑录的《霓裳续谱》,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上刊登的民歌,40年代至50年代新民歌运动之前结集出版的西北民歌,《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卷、宁夏卷、新疆卷、陕西卷中记录的汉、回族民歌,青海省出版的民歌集以及有关陕甘回民起义和迁徙的历史背景材料。

3. 作者的田野记录。为了获得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在1997年2月至5月期间,作者跟随本师王昆吾先生去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东干人主要居住区,对东干民歌的流传情况进行了实地调查。此次调查采访东干歌手28人、东干学者8人,采录民歌123首、民间器乐牌子曲4首、图片和录像资料若干,搜集了一些有关东干民歌的出版物。此后,作者又对流传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昌吉回族自治区和伊犁地区的回族民歌进行了调查,在银川市和兰州市了解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和甘肃省的民歌集成工作情况。本文使用的东干民歌材料主要来自吉、哈两国的调查。东干民歌的歌词和曲调均由作者记出,后文中不再标出。东干方言的语音用汉语拼音标记。

注释:

(1) 吴同瑞等《中国俗文学概论》, 28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2)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民间文学”条,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3)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2月1日之《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

(4) [苏联]维诺格拉多夫《五首东干民歌》, 载《苏联音乐》(俄文), 1950年第3期。

(5) 胡振华《苏联回族文学概述》, 载《宁夏大学学报》, 1990年第1期。

“东干”是俄文 Дунган 的汉译，原为中国西北地区和中亚一带操突厥语的民族对回民的称呼。东干人入俄后，俄国人沿用了这个称呼。苏联十月革命后，东干人成为苏联的一个少数民族，“东干”遂成为苏联官方以及在国际上使用的正式族称。东干人自称“回族”、“老回回”、“中原人”。前两种自称，与今日中国西北地区的回族的自称完全相同；后一种自称则表达着他们对故土的思念。他们常给中国的来访者提起“根子在中国”的话题。

一、东干人向中亚的迁徙

19 世纪末，东干人有两次向中亚俄属地区的群体移民活动，其起因与中国近代史上两起重大的历史事件密切相关：1862 — 1877 年的西北回民起义和 1881 年《中俄伊犁条约》的签订。

1862 年（清末同治元年），中国西北地区的回民不堪忍受清政府的民族歧视和压迫，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发起了大规模的抗清起义。起义首先在陕西发起，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的回民先后响应，整个西北地区迅速形成燎原之势，极大地打击了清政府在西北地区的统治力量。1868 年，清政府任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在左宗棠“先陕后甘”的镇压步骤下，陕甘回民起义军在此后的几年中逐渐向西移动，并会同所经之地的回民起义者共同抗清。1873 年，陕甘回民起义军白彦虎率所部进入新疆，先与新疆回民联合抗清，后又与占据新疆大部的中亚浩罕汗国侵略者阿古柏匪帮合流。1876 年，左宗棠受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清军西征新疆。1877 年冬，陕甘回民起义军终于在新疆失败。为躲避清军的追杀，起义军残部携眷分三路进入俄属中亚地区。第一路由马大人带领甘肃籍的吐鲁番回民从喀什西出境，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与乌孜别克斯坦交界的奥什一带定居，抵达该地时有 1700 余人；第二路由大师傅带领部分甘肃籍回民从阿克苏西出境，有 1100 余人抵达吉尔吉斯斯坦东部的普尔热瓦尔斯克定居；第三路由陕甘回民起义军首领白彦虎带领陕西籍回民从喀什西北出境，翻越天山抵达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南岸的托克马克，一年后在楚河北岸哈萨克斯坦境内定居，当时有 3300 余人⁽¹⁾。

新疆回民原籍陕甘，清政府从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起，以“屯垦实边”的名义将大批陕甘回民迁往新疆的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玛纳斯、伊犁等地。到 19 世纪 60 年代，回族已在新疆，尤其是北疆居民中占有相当比重。当时“整个整个的县城，如玛纳斯县，居民一色是东干人，就连当时作为大行政中心的乌鲁木齐城里，东干人也比汉族人、满族人多，而在伊犁河谷更多”⁽²⁾。左宗棠

进军新疆时，也带来了被招抚的陕甘回民起义军组成的部队——“旌善五旗”，这支部队被遣散留新屯田。此外，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也有大批陕甘回民被迫迁居新疆。1871年，沙俄侵占新疆伊犁地区。1881年，中俄签定《中俄伊犁条约》，俄国政府向中国归还了伊犁九城。该条约中与伊犁回民迁徙俄国直接有关的内容是“伊犁居民，或愿仍居中国原处为中国民，或愿迁居俄国入俄籍者，均听其便”。伊犁回民得知俄国人撤军的消息后，担心当年陕甘回民的悲剧重演，于是根据条约的有关规定，提出申请加入俄国国籍并迁入俄国。伊犁回民移居俄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求得土地资源而生存。这一时期，来自各种渠道的消息都表明：1877—1878年西迁中亚的回族在那里获得了土地并过上了平静的生活，而且与吉尔吉斯人民和哈萨克人民建立了深厚情谊。这些消息对许多贫苦的回族人民来说，无疑是极有吸引力的。此外，俄国当局还在充实本国兵力和劳力的利益驱动下，违约胁迫伊犁回民入俄。《清季外交史料》记载：“前此俄国留兵一年，名为保护愿迁入俄籍之人，其实日事迫胁。所迁之民，多非情愿。比以限期日近，俄人在库勒扎（伊犁）驱迫益急。其不愿迁徙者，鞭挞立至，哀号之声彻于四野”。这些情景为当时的伊犁将军金顺亲眼目睹，随即派员责问：“约载迁居之民原听其便。兹以刑驱，谏可谓之情愿？”俄官无言以对，被迫“稍稍敛息”（3）。由于以上几种主要原因，《中俄伊犁条约》签定后，伊犁地区回民4600余人遂迁入俄国，在哈萨克斯坦的潘菲洛夫、阿拉木图、江布尔以及吉尔吉斯斯坦的楚河南岸谷地、伊塞克湖一带定居（4）。本世纪30年代，少数东干人回到伊犁，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60年代初又返回前苏联。

回顾上述历史的意义在于：陕甘回民起义军的西移路线和新疆回民入俄的迁徙过程给我们指示着东干民歌的重要来源。此外，民歌本身也提供了有关西北回民这段迁徙史的信息。本世纪50年代，苏北海教授在新疆搜集到一首回族叙事民歌《歌唱英雄白彦虎》（5），歌中叙述了白彦虎部出青海，经河西走廊进入新疆的迁徙过程。以下转录与迁徙路线有关的部分歌词：

（原载《西北民族研究》1983年第1期）

陕西省(6)白彦虎是好汉，
□(7)里长矛打得欢，
一打打了十三年，
死的汉人真不少，
回回也死了几十万。
左宫保(8)，是屠夫，
带上马安良(9)军队把他追，
一追追在嘉峪关，
.....

白彦虎一人能当千员将，
分开家眷头里走，
三万人马紧跟随，
整整战了七八天。
家眷安在敦煌地，
放了四十个探马把路探，
一探探在猩猩峡(10)，
.....
一在敦煌住了半年整，

狗贼马安良军队他来到，
白彦虎一看紧动员，
黑夜三更把令传：
“大队保上家眷走，
我在敦煌安慰老百姓。”

.....

出了城，往前行，
一走走了好几天，
一起都是戈壁滩，
马安良军队后边紧跟随。

.....

猩猩峡没久站，
一来来到哈密城前，
哈密城的景致真好看，

王爷府在前面，
维吾尔人说话一句也不懂。
哈密城没久站，
大队撤在放马塘，
放马塘只是个镇子地，
又往前走，来到了古城子(11)。

古城子，好地方，
大清家满州有多少，
一住住了十七八天。

.....

白彦虎收了队，
一来来在红庙子(12)，
红庙子没久站，
就到了玛纳斯(13)。

在东干人中流传的民歌《老回回过国》(14)则真实地记录了伊犁回民入俄的背景以及入俄后的迁徙路线和定居过程。

.....

光绪年(15)，逃了国，实是可怜，
众百姓，跟上受了磨难，
小英雄，吆牛车，一溜一串，
来到三道河子(16)扎到一岸，
女人家，养娃娃，好像鸡儿下蛋。

套牛车往前走得现看，
来到萨马尔(17)站，这搭儿红柳滩，
套牛车，往前走，一站一站，
走到阿拉木图，城堡实在好看，
阿拉木图走的走，站的立站。

套车马往前走上几站。
来到皮斯该(18)这搭儿巷子宽，
看去皮斯该时事翻转(19)，
这搭儿的羊肉卖的三个钱，
牛肉卖的两个铜板钱，
娃们吃上有劲喊少年，

老汉们吃上有劲唱乱弹。

皮斯该走骚葫芦(20)过的是一站，
路上尽是荒草滩，
麻雀儿起群都飞上了天，
来到骚葫芦挂毡轱有大滩。

眼睛睁开一溜丝杆，
往北看皮斯该的湖窝草滩，
往南看套克马(21)的大山湾，
来到套克马，没怎还立站。

往东看营盘(22)里的山，
陕西人买卖做得欢，
一个听(23)买萝卜好价钱，
两个听韭菜不敢多贱。

走东过了吉尔嘎郎(24)的泉，

往前走到艾尔代克(25)阳山湾，
花花子(26)种了个一架滩，
收上的人唱了少年，
收不上的人翻白眼。

浪了一转转了回还，
皮斯该的上山里荒草滩，
黄长虫连黄蟒一般，
女人看见头绳打战，

娃娃看见连哭带喊。

上山里插犁铧草湖绿滩，
苇子窝里野鸡转，
鸭子飞起遮了天，
上山里种麦子打过百担，
秋里河(27)傍里刮稻子撵过千担，
这么价我们住站。

二、人口分布以及生产、生活习俗

中亚东干人的人口从入俄时的 1 万人左右已经发展到目前的 10 万人以上。东干人几乎每家都有五、六个孩子，有的人家多达十几个。由于东干人结婚、生育的年龄较低，“四世同堂”的情况十分普遍。东干人是东干民歌的承载者，高达 5 % 以上的年平均人口增长给东干民歌的传承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中亚东干人主要居住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孜别克斯坦三国。吉尔吉斯斯坦面积 198,500 平方公里，人口 400 余万。19 世纪后半期，成为帝俄占领区。十月革命后，1924 年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个自治州，1926 年成立自治共和国，1936 年成为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首都比什凯克（旧称伏龙芝）。北和东北邻哈萨克斯坦；西南与乌孜别克斯坦毗连，南面是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东面与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接壤。全境多山，其中北部为天山山脉西段。低地仅占土地面积的 15%。纳伦河及楚河为主要河流。东部有著名的伊塞克湖。大陆性气候显著，山区与谷地气候垂直变化大。生产以牧业为主，农业为辅，工业有煤炭、电力、石油和农产品加工业等。主要民族为吉尔吉斯人，约占总人口的 50% 以上，其次是俄罗斯人、乌孜别克人、乌克兰人、德国人（1941 年从苏联西部迁至中亚）、哈萨克人等。东干人口约占该国总人口的 1.2%。吉尔吉斯斯坦的东干人主要居住在楚河南岸的比什凯克市、托克玛克市、坎特区的米粮川乡、红旗乡、红色米粮滩乡、楚河区的坎布龙乡、火星乡、米丘林乡、莫斯科区的骚葫芦乡，伊塞克湖一带的普尔热瓦尔斯克市、雷巴契市、节提奥吾孜区的伊尔德克乡以及卡拉苏区的红色的东方乡等地。

哈萨克斯坦面积 2,717,300 平方公里，人口 1700 余万。18 世纪初叶至 19 世纪中叶逐步并入俄罗斯帝国。十月革命后，1920 年成为俄罗斯联邦中的一个自治共和国，1936 年成为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北界俄罗斯，西邻里海及土库曼斯坦，南邻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孜别克斯坦，东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接壤。平原和低地占土地面积的 80%。大陆性气候。境内河流湖泊众多，

主要有额尔齐斯河、乌拉尔河、锡尔河、巴尔喀什湖、斋桑湖等。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工业农业均比较发达。各民族中俄罗斯人口最多，其次是哈萨克人、乌克兰人、德国人、鞑靼人、乌孜别克人等。东干人口仅占该国总人口的0.25%左右。哈萨克斯坦的东干人主要居住在阿拉木图市、潘菲洛夫市、塔尔迪—库勒干市、江布尔市和库尔达依区的马三成乡（东干人称“营盘”）、绍尔图拜乡，斯维尔德洛夫区的加勒帕克图拜乡等地。

只有4%左右的东干人居住在乌孜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市、安集延市、费尔干市以及前苏联的其他地区。

楚河中、下游河段是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界河，该流域是中亚的人口稠密地区之一，也是东干人的主要居住区。东干人的人口分布同中国回族大分散、小聚居的格局相似，形成了与吉尔吉斯、哈萨克、俄罗斯、乌孜别克等民族杂居并按陕西、甘肃群体聚居的分布特征。在楚河流域，东干人口占70%以上的乡庄有吉尔吉斯斯坦的骚葫芦乡、米粮川乡和哈萨克斯坦的马三成乡、绍尔图拜乡等。这些东干人聚居的乡庄是东干民歌的主要存储区。

马三成乡位于楚河北岸，原名卡拉库努孜，属哈萨克斯坦江布尔省库尔达依区，距楚河南岸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十公里左右，是最早的东干聚居区之一。1877年末，白彦虎率领陕西起义军初到该地时，这里还是一片荒草滩，但依山傍水，适宜农耕。他们在第二年春天开始耕种，并在村子里修建了清真寺，人们围寺而居，形成了卡拉库努孜东干乡。“卡拉库努孜”是哈萨克语音译，即“黑甲虫”的意思。按东干人的解释，当初东干人刚来此地时，整天穿着黑衣服从早到晚地在田间刨地，头也不抬，周围居民笑他们就象“黑甲虫”一样。故有此称。也有人说因为该乡靠近卡拉库努孜河，故称。1892年，这里被命名为尼古拉耶夫斯克。但东干人直到现在一直将这里称为“营盘”——作为东干人的大本营，它在东干人的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1978年起，为纪念东干人民英雄的儿子马革子·马三成，该乡改名为马三成乡。据该乡政府1997年统计，全乡有14个民族，共9406人，其中东干人8373人，占总人口的89.02%，此外有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俄罗斯族、日尔曼族、维吾尔族等。

绍尔图拜乡位于楚河北沿，亦被东干人称为“新渠”或“新区”，属哈萨克斯坦江布尔省库尔达依区，北邻马三成乡，南与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隔河相望。该乡的东干人居民是从卡拉库努孜迁移过来的。白彦虎率东干人在卡拉库努孜安居几年后，在东干人西迁前已存在的伊斯兰教派之间的矛盾又被引发出来。在1862—1877年西北地区回民起义时，不同教派的回族穆斯林为了民族的共同利益，摒弃前嫌而投入到反清斗争的大潮。东干移民入俄之初，仍然按照军事时期的严格法规生活，但在和平环境下，在劳动生产的条件下，这种军事法规逐渐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阻碍作用，并导致了居民对这种制度的不满及其管

理人员的反抗。白彦虎时任卡拉库努孜乡的乡长，他的主要助手和亲信基本上都和白彦虎一样属于“新教”，一些属于“老教”派的人认为他重用亲信压迫群众而上告官府。接到上告后，七河州军事总督命令卡拉库努孜乡进行重新选举。在选举会场上，移民们按派别不同分成两组，每个教派的人都希望自己的代表能被选为乡长或担任某项领导职务。当有人提出由白彦虎任乡长时，反对他的人就大喊：“大人（白彦虎）‘亚曼’（突厥语音译，即“不好”）”，支持白彦虎的人站出来保护他，高喊“大人‘亚克西’（好）”。这就是中亚陕西籍东干人中所谓“亚克西”派和“亚曼”派的由来。两派人们各执其是，甚至发生斗殴，迫使当地行政当局停止选举，卡拉库努孜乡由带有哥萨克骑兵连的管理人员来管理。后来，“亚克西”派表示愿意抛弃自己的房屋，迁移到另外的地方去生活以避开日益尖锐的两派之间的矛盾。当地政府也正怕事端闹大不好收拾，于是答应这部分人迁到离卡拉库努孜五公里处楚河右岸的绍尔图拜，这就是东干人的“新区”。新居民区的东干人开始挖渠以引楚河水灌溉，称之为“新渠”。如今绍尔图拜乡有两个自然村：绍尔图拜和扎伊木卡。全乡共有人口 10823 人，其中东干人 10345 人，占全乡总人口的 95.58 %。其他民族有哈萨克族、俄罗斯族和卡拉恰耶夫族等（1997 年绍尔秋别乡政府统计资料）。

米粮川乡位于楚河南岸，属吉尔吉斯斯坦秋伊省坎特区，西距首都比什凯克市 30 公里，东距托克马克市 40 公里，南距坎特市 14 公里，是甘肃籍东干人聚居地之一。1924 年，比什凯克有 44 名东干人来到米粮川种植水稻，以后逐渐定居下来。1925 年，搬到这里来的东干人组成了“红东方”劳动组合小组共同从事生产劳动。他们取得了不错的收成，吸引更多的东干人从比什凯克迁到米粮川。到 1927 年，已有 200 余人，形成了一个新的东干乡庄。由于这里地势平坦、水源充足，以种植水稻为主，东干人给这里取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中国式名字“米粮川”——“米粮川，喜爱川，你就是我的俊春天。老远把你看见，好象一个大花园”——米粮川的东干人经常吟咏这样的歌谣赞美自己的乡庄。1931 年，米粮川成立了“伏龙芝”集体农庄。该乡共有人口 4489 人，其中东干人 4315 人，占全乡总人口的 96.12 %。其他民族有吉尔吉斯族、俄罗斯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等（1997 年米粮川乡政府统计资料）。

骚葫芦乡位于楚河南岸比什凯克以西 30 公里处，属吉尔吉斯斯坦秋伊省莫斯科区，俄罗斯人称这里是“阿历克山德罗夫卡”（以沙皇名字命名），吉尔吉斯人称之为“索克鲁克”，而东干人则习惯用符合自己发音特点的名称“骚葫芦”。1881 年，新疆伊犁籍东干人移居该地。1883 年，他们挖渠引楚河水灌溉以解决缺水问题。这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东干人挖的第一条水渠，东干人称之为“黄渠”，而当地吉尔吉斯人称之为“东干渠”。到 1884 年，索克鲁克的东干移民家庭基本上建起了自己的住房，并在当地修建了清真寺。昔日的荒滩变成了一个欣欣向